

本书编委会 编

龚书铎先生
纪念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龚书铎先生
纪念集

本书编委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 / 本书编委会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303-17093-7

I. ①龚… II. ①本… III. ①龚书铎 (1929~2011)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23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22.5

插页: 5

字数: 29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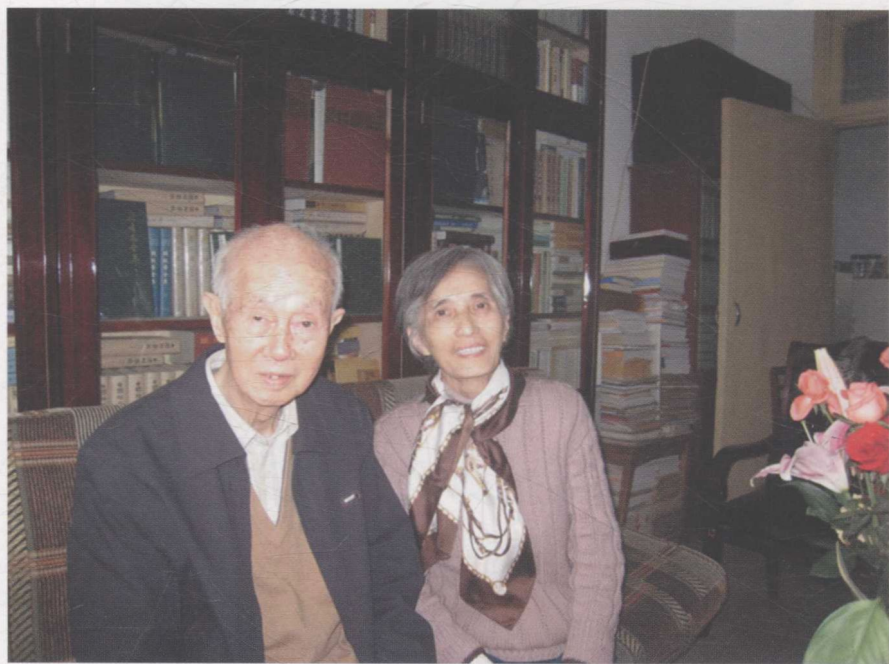
龚书铎教授(1929—2011)



学生照(1950 年)



结婚照(196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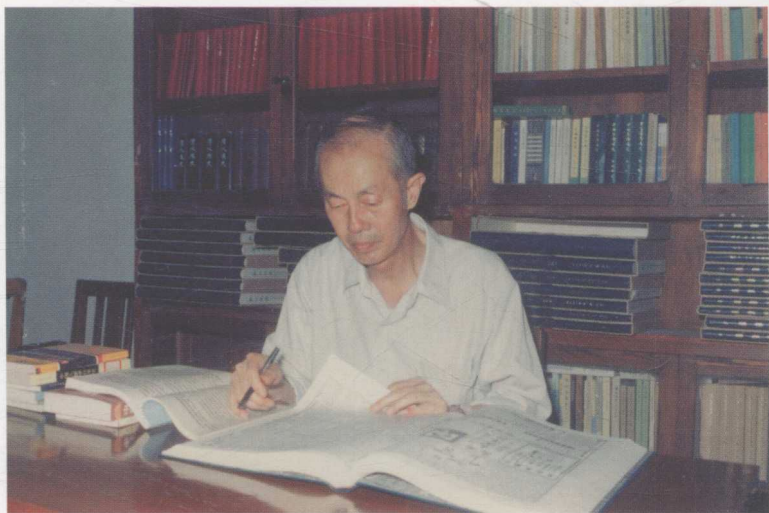
与夫人张萍子合影(2009 年)



在報告會上



在報告會上



在查阅史料



学术会议留影(2007年)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合影(1984年,前排左二为龚书铎先生)



孙中山学术研讨会论文评审会合影(2006年)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会议合影



《清代理学史》出版研讨会留影(2007年)



与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刘家和先生在一起



与史学所同事合影



与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同事合影(2004 年)



博士生金庆惠学位论文答辩会合影(1999 年)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座谈会

2008. 11. 22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与弟子们合影（2008年）

题献

蔡中峰先生纪念文集

学界望隆 鸿篇累帙

门墙熙盛 桃李芳菲

刘家和敬题

刘家和先生为文集题词

代 序

李文海

2009年，书铎同志八十华诞，他的弟子们为他编辑学术论文集《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以示纪念。孙燕京同志嘱我写个序言，我未加犹豫，欣然从命。转眼四年过去了，书铎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半，他的弟子们要出追思文集，再次嘱我写篇短文，我却因健康原因无法动笔，只得商请燕京同志以学术论文集序言为底，略作修改，聊以塞责。

书铎同志2007年发现患癌，动了手术。在他住院的前几天，我们恰好一直在一起。那是我们同去澳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在机场候机，他淡淡地跟我说：“回去以后我要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我当时并未在意。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想问问旅途劳累有没有不适，却不料一连三天联系不上。到第四天才知道做了手术，我感到很震惊，也很为他担忧。

不管是论学问还是论年纪，书铎同志都是我的学长。每当学习上有什么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们相识已经几十年，不避攀附之嫌，大概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了。可是真要仔细回想一下数十年的交往，不要说根本没有什么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逸事佳话，就是稍微有点生动有趣的小花絮也找不出一件来。有的只不过是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的机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聊天。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不必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讲究分寸，注意方法，相互之间

无所戒备，套一句老话，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有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快乐；郁闷的时候，互相诉说也借此消除了些许烦恼。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相同的看法，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争论几句，但争完后一如既往，并不心存芥蒂。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交往，实在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不过这里要赶快申明一句：这“白开水”的比喻，只是说明我们交往的平淡单调，丝毫没有想借助“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把自己硬挤进“君子”圈子里去的意思。

如果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几乎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是在他动完手术几个月之后。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夫人悉心照顾着，但完全同外界隔离了开来。身体略有恢复，但工作还无法进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独坐斗室，这对他身体的康复是不利的。恰好那个时候，戴逸同志因为主持清史编纂工程，忙得心力交瘁，承受着工作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便组织了一次老友的聚会，一来让书铎同志舒缓心情，二来让戴逸同志释放压力，有一个休闲的机会。参加活动的除戴逸、书铎两位外，还有金冲及、胡绳武、王玉璞、王思治、陈铮、孙喆以及戴逸夫人刘炎以及我和吴孝英，共11人。由我负责策划，孙喆具体承办。我们在圆明园包了一个茶室，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窗外是一片荷塘，荷花还没有开，但荷叶已经葱绿挺立，生机盎然。正好那天金冲及同志带来了一张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照片。那次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老一辈史学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李达、胡绳、吴晗、刘大年等，都参加了。这次参加聚会的11人中，有6个人也有幸出席，只是那时我们都还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我们看着照片上少数仍然健在的人，想起老一辈史学界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不禁叹时光之流逝，感人事之沧桑。从这里谈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风风雨雨，朝朝暮暮，真有点《兰亭集序》里写的“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

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的味道。不久前同戴逸同志谈起这次聚会，我们还觉得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可惜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书铎同志、思治同志、刘炎同志已先后仙逝，令人感叹不已。

书铎同志是一位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术充满感情的人。我和他同在清史《研究丛刊》编委会工作，他不但对每部书稿进行认真的讨论，而且就在身患癌症之后，仍然主审了多部稿子，每部几十万字的书稿，他一字不拉地细心阅读，既写出对书稿的总体评价，又详细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然后提供给编委会共同讨论。他还接受清史编委会的委托，审读了不少新修清史的阶段性成果，并提出书面的审读意见及修改建议，一直到二次进入医院，仍然在病床上阅读书稿。在当前学术界浮躁、急功近利颇盛的风气下，这种坚持，这种责任感，是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的。

大凡一个优秀的、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主要精力，大体只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一是培养一批青年学者。或者说，一个是学科建设，一个是队伍建设。“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这两句话，大概可以成为他们学术品格的共同写照。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有在治学中做出自己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以此团聚一支学术队伍；也只有建设好一支精良的学术团队，才能够形成合力，进行学术攻关，完成更多的学术创造。如果只是孤军奋战，本事再大，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以为，书铎同志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是很出色的。

书铎同志的学术成就，著作俱在，无需多说。《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中收录的《龚书铎先生学术生涯记述》，对此也有详细客观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书铎同志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从整个史学史来说，自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迅速进步，这本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会加以否认。但是近年来，却偏偏有人对唯物史

观大张挞伐，说什么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并把这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家”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障碍”。加给唯物史观的这个罪名，我以为未免失之于武断。谁都清楚，政治上的“威胁”和“压力”也好，“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也好，是决然无法使人建立起自觉的理想信念的。至于信仰唯物史观是否必然同“理性探索精神”相对立，我们可以借用列宁的一段话来回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运用唯物史观，究竟会对史学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我们不妨以书铎同志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个案解剖一下。书铎同志曾经写下“学术研究当求是而戒趋时”这句话，作为自己“治学的箴言”，他自己是严格践行了的。我们且不谈他的近代文化史研究，远远早于学术界所谓的“文化热”之前，虽然不必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夸之为引领了学术潮流，至少表明他并非一味盲目地跟风、赶时髦，而是自主地开拓着新的学术领域。我们也不谈他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及《清代理学史》，如何筚路蓝缕，做着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仅以他同李侃等同志集体编写、由书铎同志对全书通阅统改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来说，此书从粉碎“四人帮”后出版，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后即共印刷了 120 万册之多，大大超过了同类历史教科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我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印行超百万册感言》的短文，发表在 1994 年 11 月 22 日的《文汇报》上。此书现在许多大学仍在使用的，这些年的印数达到了多少，就不大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假如真的是一群缺乏“理性探索精神”，“丧失了历史批判能力”的“史家”们所写的书，却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体，这实在让人难以索解。而这样的指责，对作者的厚诬